



煮茶论道 □刘诚龙

我之医即君之诗

范仲淹当年前途渺茫,曾求僧问道:“范仲淹微时尝诣灵祠求祷,曰:‘他时得位相乎?’复祷曰:‘不然,愿为良医,亦不许。既而叹曰:‘夫不能利泽生民,非大丈夫平生之志。’”范公典故可证者二:一、良相与良医一心,都可以利泽生民;二、良相与良医不可一体,做了良相便不能做良医了,做了良医就不能做良相了。

良相与良医不可兼得,那良诗与良医呢?私以为,既为一心,又可一体。文学有一大好处:不挑地,不挑人。地不分南北,人不分老幼,位不分高下,职不分三教九流,一官二吏至九儒十丐,都可以来做文人。

更妙处是,做文人与职属三百六十行人,无甚冲突,多相成就,日昼做工,不妨月夜作诗。

“吴门名医薛雪,自号一瓢,性孤傲,公卿延之不肯往,而予有疾,则不招而至。”这里所称之为“予”,是袁枚。这话引自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。袁枚这书,可证文或有档次之差,却无职业之别,诗词歌赋不需要专业,各行业者都可当诗人,当小说家,当散文家。《随园诗话》里记录了很多五医六工、七匠八娼当诗人的。大医者薛雪,就是一位好诗人,“先生诗亦不凡,《夜别汪山樵》云:‘客中怜客去,烧烛送归烧。把手各无语,寒江正落潮。异乡难跋涉,旧业有渔樵。切莫依人惯,家贫子尚娇。’《嘲陶令》云:‘又向门前栽五柳,风来依旧折腰枝。’咏《汉高》云:‘恰笑手提三尺剑,斩蛇容易割鸡难。’《偶成》云:‘窗添墨谱摇新竹,几印连环按覆盂。’”

薛雪诗写得蛮好,医行尤其神,袁枚记录了两则故事,果然是神医。“乙酉春,余在苏州,果人王小余病疫不起,将掩棺,而君来;天已晚,烧烛照之,笑曰:‘死矣。’袁枚是美食家,家里日日夜夜高朋满座,不留宿,留餐是肯定的,家中请了好些厨子师傅,其中某次王小余病人膏肓,走到了奈何桥头,袁枚仁爱,特去请薛医生来。薛医生连忙赶来,探了脉息,笑曰‘死矣’。

病人死,医者笑,必有蹊跷。蹊跷是,薛医生有十足把握起死回生:“吾好与疫鬼战,恐得胜亦未可知。”他开了方子,“出药一丸,捣石菖蒲汁调和,命夫与有力者,用铁箸楔其齿灌之”。王小余之病算是病得重的了,嘴巴都扳不开,须是大力士用铁棍去敲开来灌药,“小余目闭气绝,喉泪汨然似咽似吐”。薛医生医嘱:“好遣人视之,鸡鸣时当有声。”也就是三四个小时,王小余活过来了,“已而果然。再服二剂而病起”。也就三副药,不住院,不打针,被其他医生宣判死刑者活过来了。真神医啊!

袁枚记了薛医生的另一件事,也是妙手回春:“乙酉冬,余又往苏

州,有厨人张庆者,得狂易之病,认日光为雪,啖少许,肠痛欲裂,诸医不效。”这病有些怪:一是神经不正常,把白日当白雪;二是吃不得东西,吃一点点东西,便痛得在地上打滚,请了蛮多医生,开过蛮多方子,都没用。薛医生来了,望闻问切使用了“望”字术,什么CT、X光、肠胃镜、核磁共振,都不曾用。“薛至,袖手向张脸上下视。”就这么上下一视,诊断了病因:“此冷痧也,一刮而愈,不必诊脉。”马上刮痧,“身现黑痕如掌大”,刮完了痧,手到病除,“亦即霍然而愈”。

袁枚亲身体验过薛医生的高明医术,他曾染疫,气息奄奄,梦悠悠入阎王殿,搁如今,当了ICU了。薛医生来了,给他开了个方子,袁枚照单抓药,只喝一个疗程,活过来了,跟没生病一般,活蹦乱跳地,与文朋诗友诗酒风流,吟诗扯淡。袁枚特作一首诗,28字当医药费付于薛医生:“十指据床扶我起,投以木瓜而已矣。咽下轻罗梦似云,觉来两眼泪如冰。”

没做手术,没吊水,单“投以木瓜”就治了病,这让袁枚甚是感谢,甚是惊奇。袁枚好奇地问:您这是啥子神术啊?薛医生笑着说:“我之医,即君之诗。纯以神行,所谓人居屋中,我来天外是也。”医生之行医跟诗人之吟诗都是一样的,靠灵感闪现,神来一笔。薛医生说得有些神乎其神。说来医道与文道真是神通的。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,断肠人在天涯。”枯藤啊、小桥啊、古道啊,这些词语好生搭配,便是好诗,医生呢?“通窍全凭好麝香,桃仁大枣与葱姜。川芎黄酒赤芍药,表里通

经第一方。”诗人是将词语好生搭配,医生是将药材好生配伍,庸医良医、诗神诗瓜所不同者,好诗人搭配好词语,好医生搭配好药材。医者:用药不良,无以展其医;医不十全,药未良而意工也。诗人是:用辞不工,无以达其意;诗不十全,意工而辞未工也。

医理与诗理贯通,医生与诗人古时也多兼通,医生兼诗人,医家常能高明,医德更能高尚,医术是济世之技,诗歌是明心之器。医生能济世,若更能明心,则医德肯定会更高,袁枚笔下的薛医生,行医高术,写诗艺高,医德高加高。他所开之方,全都是寻常药,药价都很低,有些还要钱。

要说一下的是,薛医生“性孤傲,公卿延之不肯往”。古之医者,常常择人而医,医生不治缺德者,这观念不太对,医生治人体,不当辨人色,与薛医生比,医生观念有进步,进步者,坏人都都治疗;医生观念有退步,退步者,治公卿治老板,用力甚勤,治平民治老百姓常是懈怠。



薛雪像

国学小知识

中国人的年龄是怎么计算的

中国人计算年龄往往有虚岁与周岁之分,周岁指的是一个人的实际年龄,虚岁则是在周岁上加一岁或两岁。这是什么道理呢?

其实,这种计算年龄的方式与我国古代的历法有一定的联系。我国古代通用的历法是阴历,与今天全世界通用的历法——公历(我们习惯称阳历)相对,阴历也叫农历或农月、旧历。古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习惯了用阴历来计算农时,渐渐地也习惯了用阴历来计算很多方面的事情。虚岁的计算就是一个例子。在古代,虽然没有统一的虚岁计算标准,但大多数人认为,孩子从出生时就应该记为一岁,因为十月怀胎在古人看来是万物有灵的体现。而以后每过一个农历新年(即春节,而非阳历新年)就增加一岁,这样虚岁往往比周岁要大。如果是腊月(阴历十二月)出生,一过春节就记为两岁,因此虚岁比周岁还要大两岁。总结起来就是:以计算年龄的时间为标准,若计算时间是在过了农历新年到生日期间,则虚岁=周岁+2(即虚两岁);若计算时间是在生日过后到农历新年期间,则虚岁=周岁+1(即虚一岁)。而周岁的计算方法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,只需按照公历的年月、日计算即可。举个例子来说,我们要在现在计算1981年6月8日出生的人的虚岁和周岁,因为农历新年已过,此人当前虚岁应该是46岁,而周岁则应该是44岁(公历2026年6月8日满45周岁)。

说文解字 □王兆贵

“牢”字探密

大约是久持的成见所致,我们一见“牢”字,便会望文生义,习惯地以为这个“牢”字,要么是指牢狱,要么是指牢固。但其实,我们祖先造此字的本义并非如此。

“牢”的甲骨文,外框三边密闭,下方留有缺口,居中刻有“牛”字,象征牛被关在栏里,其本义是圈养牲畜的围栏。

在我国古代,尽管也用“大”来量度事物,但这并非顶级,至高无上用“太”字,如太庙、太子、太上皇等。作为高级祭祀用品的牛,则称“太牢”。

远古时期,祭祀礼仪中最高规格的祭品组合是牛、羊、猪,叫作“大三牲”。牛象征着勤勉与力量;羊代表着吉祥与和谐;猪寓意是富足丰饶。你看这个“牲”字,就是活牛宰杀后的贡品。

联系起来看,这个“牢”字当真牛得很。当“牢”里的牛被牵进太庙,就镀上了神性之光,成为周天子专属的举世头号祭品。诸侯祭品不得用牛,所以称为“少牢”。

这就告诉我们,决定文字命运的,不单是笔画,而是它服务对象的阶层。

那么,“牢”字是怎么转变为牢房的呢?从“牲口栏”到“监狱”,是场惊心动魄的语义越界。

第一次转义在周朝,因祭祀需要毛色纯一的牺牲品,“牢”就引申为经严格筛选的牛。

第二次“黑化”在先秦甚至更早,那还是只是约束与限制活动范围的比喻,后世法家则将限制异化为司法管控,商鞅把“画地为牢”变成真牢房。

后来经过固化,篆书把甲骨文的缺口封了起来,“牢”就彻底沦为禁锢符号,象征牢笼。文字如人,一旦被权力任用,就再难回到初心。汉字的特性,不仅有表音功能,还有表意的功能,每一个汉字都如同考古发掘,而你我,都在续写它的铭文。

东海海错 □李振南

三春银鱼味正浓

“小艇瓜皮桂棹香,登瀛桥上趁潮忙。阿依一网先开利,捞出银鱼三寸长。”清代诗人周斌的这首《柳溪竹枝词》,向我们展现了早年渔民张捕银鱼的生动画面,也让我们感受到捕鱼动态之美:一舟一楫,在浪尖上摇曳起伏,随波出没;一人一网,捕获的银鱼活蹦乱跳,银光闪亮。

银鱼是鱼类中的小不点,一般身长只有6~9厘米,最大的也不会超过15厘米。因其洁白晶莹、圆润纤细、色泽如银,恰似古代妇女发髻上的银簪而得名。据志书记载,全世界有银鱼17种,而我国海域从南到北就分布着15种。根据银鱼的生活习性,它们平常生活在近海的江河河口,也可以在纯粹的淡水里生活。据说在淡水里长期生活的银鱼,刚孵化出的小银鱼都会拼命游向大海,只有到产卵时才会重新进入江河湖泊,在岸边水草从生地繁殖。银鱼的这种特性,专业上叫做“溯河性鱼类”。

银鱼虽然很小,却很早就进入了我国的许多古籍,并有鲈鱼、银条鱼、银花鱼、面条鱼、面丈鱼、冰鱼、玻璃鱼、白小等别称。西晋张华在《博物志》中写:“吴王曾江行食脍,有余,因弃之中流,化而为鱼,今有鱼犹名吴余脍者,长数寸,大如筋,尚类脍形也。”宋代吴曾则在《能改斋漫录》中引《太平广记》云:“晋宝志尝于台城对梁武帝吃脍。武帝曰:‘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。师何云尔。’志公乃吐出小小鱼,依依鳞尾。如今秣陵尚有鲈鱼也。”这是鲈鱼名字的由来。

国人历来喜爱银鱼,也赞美银鱼,留下了大量的诗篇。唐代大诗人杜甫有《白小》诗云:“白小群分命,天然二寸鱼。细微沾水族,风俗当园蔬。入肆银花乱,倾箱雪片虚。生成犹拾卵,尽取义何如。”皮日休也有《松江早春》诗:“松陵

清净雪消初,见底新安恐未如。稳凭船舷无一事,分明数得鲈残鱼。”清代文人陈文瑞还有《丰城竹枝词》:“银鱼纤小玉生芽,上市鲜甜价倍加。最是乡谈风味好,曲江茶叶簪塘瓜。”在众多写银鱼的诗词中,常常被引用的有两首,一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《送巢县崔尉》诗:“巢湖映微霁,照眼正清洗。低昂避高灾,明灭映葭苇。银花脍肥鱼,玉粒炊香米。居人自丰乐,不与他乡比。”二是张先的《吴江》诗:“春后银鱼霜下鲈,远人曾到合思芦。欲图江色不上笔,静觅鸟声深在芦。落日未昏闻市散,青天都净见山孤。桥南水涨虹垂影,清夜澄光照太湖。”这两首诗中的“银花脍肥鱼”和“春后银鱼霜下鲈”二句,一直被认为是写银鱼的名句,深受人们喜爱。

银鱼肉质细嫩,味道鲜美,而且是富含蛋白质和高钙质的鱼类,营养学家将它列为长寿食品,誉其为水中珍品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对银鱼作了较详细的记述:“银鱼,大者四五寸,身圆如纺,洁白如银,彼人尤重小者,曝干以货四方。清明有子,食之甚美;清明后子瘦,但可作酢腊耳。”

银鱼人看是席上珍馐。由于它不用去鳍、去骨,甚至连剖腹取胆、抠鳃等环节都不需要,用清水洗净即可,所以也是最容易烧制且最能够保持原生状态的菜肴之一。银鱼的制作方法很多,煎炒油炸、蒸煮炖烩皆可。在乐清湾沿岸,烹饪银鱼最常见的方法是“银鱼炒蛋”,白玉般的银鱼,被金黄色的炒蛋包裹着,简直就是现代版的金镶玉,能极大地激起人们的食欲。伸箸一尝,蛋之香裹着银鱼的滑嫩,于舌尖不断流动,且回味特别长久,单单一个“鲜”字已无法完全概括,让人惊艳不已。

闲话斋 □侯杰

王初桐和他的“猫咪宝典”

如今,吸猫、撸猫已成许多人的日常,而早在两百年前的清代,曾任多地知县的文人王初桐,便专为猫咪著书立说,留下了中国古代最系统的“猫文化百科”——《猫乘》。

王初桐出生在上海嘉定一个贫寒家庭,自幼嗜书如命,不到30岁便考中秀才。然仕途坎坷,48岁才通过恩科步入官场,在山东为官20年,历任新城、淄川、平阴、寿光等地的知县。他政简刑清,重视教化,曾不动刑具审结30件积案,深得百姓爱戴,同僚敬重。晚年辞官后,潜心刻书著书,一生著述达40种,其中《炙史》与《猫乘》弥补了中国古典文献的空白。

在《猫乘》问世之前,中国几乎没有专门研究猫的书籍。王初桐耗费心力,从300余种古籍中辑录猫的相关文献,最终编纂成八卷本的《猫乘》。此书涵盖猫的学名、品种、呼唤、孕育、形体、灵异、名物、品鉴等诸多方面,开创了猫文化系统研究的先河。

这部奇书的诞生,缘起于一场

文人之间的咏猫雅事。嘉庆三年(1798),古稀之年的王初桐见同乡钱葆勤作《雪狮儿·咏猫》引得一众文人唱和,众人皆搜罗猫事入词,极尽搜罗幽僻典故之能,他也兴致勃勃地填了三首,却自觉所作难合词家婉约清空的意旨,心中不甚满意。

彼时,经史典籍中关于猫的记载本就寥寥,相关轶事多散见于传记百家之书。这场咏猫词的唱和,让王初桐萌生了为猫辑录一部专书的念头。于是,他在日常校勘典籍的闲暇,吩咐抄书人广搜博采,凡经史子集、笔记小说中涉猫的文字,皆一一收录。日积月累,这些零散的材料积成卷轴,王初桐又亲手削繁去冗、分门别类,最终将其整理成书,取名《猫乘》。他将这部书归为《相马经》《虎苑》一类的典籍,直言此书“虽无关于大道,亦著墨家所不废也”,并将其刊刻传世,只为“以贻好事者”,给天下爱猫人留下一部可读之作。

“乘”者,载籍也,《猫乘》之名,便是“猫咪的专属典籍”之意。这部

书内容包罗万象,堪称古代猫奴的“终极指南”。书中先述猫之起源与品类,从“猫为虎师”的传说,到不同毛色猫咪的雅称——纯白猫叫“尺玉”,纯黑猫名“墨玉”,黄白相间者号“金丝虎”,无不透着文人的雅趣。

王初桐还在书中搜罗了历代与猫相关的典故轶事,宋代陆游“溪柴火软毡毡暖,我与狸奴不出门”的闲情、明代文徵明养猫伴读的雅事,皆被收录其中。更实用的是,书中还记载了养猫技巧与治猫之病的偏方,从如何挑选温顺猫咪,到如何防治猫瘟,细致入微,尽显生活智慧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猫乘》的编纂延续了王初桐治学的严谨。全书参考典籍达数千种,凡涉猫事皆不放过,既保留了《尔雅》《太平广记》等经典中的记载,也收录了民间流传的趣闻,体例清晰,考据详实。这部书不仅是爱猫人的精神食粮,更为后世研究古代民俗、动物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。

“乘”者,载籍也,《猫乘》之名,便是“猫咪的专属典籍”之意。这部

诗话亭 □陈大新

从《水边偶题》看罗隐的愤激

罗隐以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(《自述》)的千古之句为人熟知,然而,他并非一味鼓吹着人生的颓废,倒是对家国兴亡、人事成败十分关切,他的诗作往往有不平与愤激表现出来。其《水边偶题》诗云:“野水无情去不回,水边花好为谁开。只知事逐眼前去,不觉老从头上来。穷似丘何休叹息,达如周召亦尘埃。思量此理何人会,蒙邑先生最有才。”

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。“野水无情去不回”正有此意。“水边花好”则让人生出物是人非之感。在世事如烟的尘寰,不知不觉人已老去。接下来诗人想起先贤:“穷似丘何休叹息,达如周召亦尘埃。”孔丘、孟轲都是儒家宗师,怀抱治国平天下的大愿,虽学究天人之际,却都穷途游走,愤恨而终,着实令人叹息;周公旦和召公奭,辅佐周成王,功绩赫赫,史留丰碑,而今却已成陈迹,让人追怀不已。至此,忽然笔锋一转:“思量此理何人会,蒙邑先生最有才。”蒙邑:战国时期思想家庄子的出生地,位于宋国国都商丘东北,蒙邑先生即庄子是也。说来想去,还是要敬服于庄子啊,他的逍遥游才是明智的。这一句实则是对现实失望后的愤激之语。罗隐没有李贺的奇瑰,也不似李商隐的朦胧,生于乱世,又处处困顿,心中不平积愤太多,诗写来也是喷薄而出,一吐胸中骨鲠。看他叹“野水无情”,叹老,叹孔孟,感慨周召时代已成陈迹,再到称说庄子,其愤世之情是强烈的。鲁迅在《小品文的危机》一文中谈到:“唐末诗风衰落,而小品放了光辉,但罗隐的《渔书》,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。”这种愤激要他不带到诗里来,恐怕是很难的。

罗隐(833-910),原名横,因屡试不第,愤而改名“隐”,字昭谏,自号“江东生”。史传他是钱塘人,曾与罗隐同在钱镠幕府的沈彬在《罗给事墓志》中说他“家本新城,地临浙水,惟彼秀色,钟乎夫子”。新城,今属杭州富阳。梁开平二年(908)为给事中,世称“罗给事”。

罗隐曾在长安遇一相者罗尊师,他对罗隐说:你志在考取功名,即使中了,不过一县尉的微职,我看君若罢举东归,必可富贵。罗隐开始在湖南等地游历,在衡阳县任过主簿,但他的性格不惯看人脸色,对此类下僚很不适应,干了一年左右,还是辞去了。黄巢起义初,一度隐居于池州梅根浦,并与宣歙观察使窦滂相往还,但终非长久之计,他在《别池阳所居》中称:“黄巢初起此留连,火疔耕六七年。”六七年不能算短,主要是避乱。离开池州他想到回乡,便去投江东的钱镠,先寄一诗,云:“一个布衲容不得,思量黄祖漫英雄。”钱镠览诗大笑,辟为掌书记,他还当过钱塘令。

据《吴越备史》载:钱镠初授镇海节度使,命沈彬起草谢表,盛言浙西富庶。罗隐劝钱镠说:如此太招人眼,惹人觊觎。钱即请罗隐起草。罗写道:“天寒而麋鹿曾游,日暮而牛羊不下。”表上,有人看出来:“此罗隐词也。”足见罗隐在当时文笔的知名。钱镠甚爱罗隐之才,一次罗隐卧病,钱镠亲往抚问,题其壁云:“黄河信有澄清日,后代应难继此才。”

罗隐貌陋,《鉴诫录》上讲到他投诗相国郑畋,被郑的女儿读到了,仰慕得很,对他的诗如痴如醉,废寝忘食。于是相国召见罗隐,郑女垂帘偷看,一见之下,从此不再咏其诗。据此说罗隐之貌实在够呛。《唐才子传》记罗隐:“性高傲,高谈阔论,满座生风。好谐谑,感遇辄发。”倒也偶觉风流。《旧五代史·罗隐传》说他:“尤长于咏史,然多所讥讽。”裴筠与萧楚公女定亲,未久便擢为进士,罗隐刺之曰:“细看月轮真有意,信知青桂近嫦娥。”唐昭宗随驾有弄猴者,猴能随班参拜,昭宗赐以绯袍,号“孙供奉”,罗隐又讥之云:“何如学取孙供奉,一笑君王便著绯。”

罗隐著述颇丰,但散佚亦多。今人雍文华辑有《罗隐集》。此外,罗隐书法极好,士大夫多有登门求字的。他与宗人罗邺、罗虬号“江东三罗”。

古风杂记 □江舟

古代官员如何领工资

月里,俸禄往往是实物与货币的奇妙组合。汉代官员领的是钱粮各半;晋代开始在俸禄单里加入绢帛;到了唐宋,茶酒、柴炭乃至马匹饲料都成为俸禄的一部分。那这些五花八门的“工资”是如何发放的呢?一种沿用唐朝的方法是“职田制”——按品级授予官员田地,以其租税收益补俸禄之不足。宋代五品地方官可享十顷职田,听来优厚,但如陆游这类官员实际仅得两项余,若在贫瘠之地任职,收成往往更低微。

俸禄主体仍需要通过官府发放。唐代实行“岁俸”与“月俸”并行,年发粮食,月发钱帛;宋代制度更为精细,除基本俸钱外,还有职钱、茶汤钱、厨料钱等名目繁多的补贴。然而这般“优厚待遇”并非雨露均沾。虞允文等高位者月俸可达数百贯,而县令月俸仅十贯左右,尚不及当时御膳房一只上等螃蟹的价钱。且南宋铜钱稀缺,俸禄常以不断贬值的纸币支付,基层官员生活之艰可

以想见。更有甚者,地方财政紧张时,俸禄常被拖欠数月,官员们不得不向钱庄借贷度日,形成“预支俸禄”的奇特现象。

明朝官员的俸禄常被后世视为微薄。七品知县年俸九十石,看似相当于地主家庭收入,但实行“折俸”制度后,禄米常被折成贬值的大明宝钞或胡椒、苏木等物,实际价值大打折扣。成化年间,一匹绢市价四百文,而折俸时却按千文计价,官员实际收入缩水过半。有趣的是,明代官员享有“免役”特权,借此大肆兼并土地,故虽表面薪资不高,实则多成田连阡陌之家。书画大家董其昌退休后以极低价购田十万亩,便是此中缩影。这种制度性缺陷导致“官愈贫而民愈困”的恶性循环,为王朝埋下隐患。

清代大体沿袭明制,雍正时增设“养廉银”以补正俸之薄。但此时官场陋规已积重难返。据《道咸宦海见闻

录》载,陕西粮道官员仅通过征收钱粮时的“浮收”,年入私囊可达六万两。各级衙门“三节两寿”的孝敬,日日不断的宴饮应酬,织就了一张巨大的利益网络。道光年间,陕西巡抚衙门日常饮食开销每年即超万两,而这一切最终都转嫁到百姓身上。这种畸形的“幸福”背后,是民脂民膏的流失与对王朝根基的侵蚀。

从陆游“禄不继则无策”的叹息,到清代官吏“燕窝烧烤取菜”的日常,一部古代官员的俸禄史,恰似一面多棱镜,既映照出个人仕途的冷暖,也折射出制度设计的得失,更暗藏着王朝兴衰的密码。那些准时或迟来的俸禄,那些明面或暗地的收入,共同勾勒出古代官僚体系真实而生动的生存图景。当俸禄制度能保障官员基本尊严时,吏治往往相对清明;当俸禄发放陷入混乱、灰色收入成为常态时,王朝的衰亡也就为时不远了。